

◀ (上接4版)

“和他们俩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12月20日,圣诞前夕,蓝曼请所有学生来家聚会,陈寅恪和罗列赫也来了,大家一起吃了可口的鸡肉馅饼,蓝曼还跟学生们讲“印地故事和所罗门的审判以及猴子和孔雀等等传说”。

一个世纪后坐在档案馆翻阅蓝曼日记,想不到这位先生在哈佛漫长的梵文教研历史和眼前的疫情倏地连在了一起。虽然蓝曼并没有直接记载此时的疫情,但是百年前的记载一下子回响在今天康桥寂静的街市和哈佛园内紧闭的教学楼和图书馆。蓝曼日记里对当年疫情流行时留学康桥的陈寅恪寥寥数笔的记录,平添了一个世纪之前梵文业内师生之志趣,实显蓝曼日记的非凡价值。

到 1952年,英格尔斯(Daniel Ingalls)接任蓝曼的弟子克拉克(Walter Eugene Clark)担任威尔士梵文教授时,将蓝曼时代的印度语文系更名为梵文和印度研究系。十年前,梵文和印度研究系再次更名为南亚系,这足以宣布北美的印度语文学已彻底与欧洲的语文学脱钩,倾向于跨学科在南亚研究。幸好,怀特纳图书馆内三楼梵文图书室百年后依然如故,既是图书室,又是教室。90年代中我们一批同学还随范德康(Leonard van der Kuijp)教授在那里上课,我们身后就是蓝曼夫妇1889年前往印度蜜月时收集的五百多册梵文和普拉克利特诸语种写的古文本和善本典籍。

读到蓝曼日记里有关印度语文学系的历史,我急着和魏策尔教授请教梵文图书室现状。魏策尔为德国梵文科班出身,1987年从荷兰莱顿来到波士顿,接任英格尔斯为第四任威尔士梵文终身教职至今。他喜闻我在读蓝曼日记,他说蓝曼从印度收集的梵文善本书如今依然按原样珍藏。“1990年前后,梵文系对所有的典籍做了记录,编目上网。”前几年图书室里添了新桌椅,别的一律依旧,几张印度学家照片和1889年来自印度的典籍依然静伴今天业内来访的寥寥无几的学子和教授。接着,他特意在电邮里分享,梵文系在上个世纪90年代收拾图书室时,在一册册蓝曼留下的梵文善本书后边,竟发现了一只威斯忌酒瓶!

蓝曼日记很多本还没顾不上翻阅,只能静候时运好转,疫情消除,学校恢复运作。下次走下校园内普西图书馆(Pusey Library)的石梯,拐入档案馆,在阅览室再次翻阅蓝曼日记时,一切将是劫后余生。(作者为哈佛燕京学社副社长)

“为救圣君哭秦庭”

——康有为给奕纳乐的两份文书

李文杰

康有为致奕纳乐信函,可谓声情并茂、义正辞严,但仔细追究,却很难寻出几句真话。康有为致奕纳乐照会之所以被历史学家所重视,主要因为其中引用了两个“密诏”的全文。第一道密诏的再加工,让我们见识到了康有为的文字手段。第二道密诏一直以来被康梁称为“衣带诏”,但是,这个诏书从公示的那一天起,就一直遭到人们的怀疑。

南官惭奉诏,北阙入无军。
抗议谁曾上,勤王竟不闻。
更无敬业卒,空讨武墨文。
痛哭秦庭去,谁为救圣君?

这是康有为在戊戌政变之后所作《国变记事》最后几句。“痛哭秦庭”,说的是春秋时期的故事。伍子胥为报家仇,率吴军灭楚,楚国大夫申包胥赶赴秦廷,向秦王晓以利害,“立依于庭墙而哭”,哭了七天,最终促使秦王出兵救楚。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在英国的保护下乘船南下,经上海到香港,向英日两国的外交官寻求援助。他号称自己两奉“密诏”,请各国设法营救皇帝。无奈的是,英日两国只是帮助康梁逃避政府的抓捕而已,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康有为在愤懑之下,写下了《国变记事》诗。

近期因准备外交史课程,翻看自己五年前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拍摄的外交部档案,发现一部档册中收录的两份中文文件格外醒目。这部英文档册的编号是FO 233/122,两份中文文件是1898年10月康有为避难香港之时,寄给英国驻华公使奕纳乐(Claude MacDonald)的信函一件与照会一件,也正是他效仿“秦庭之哭”的物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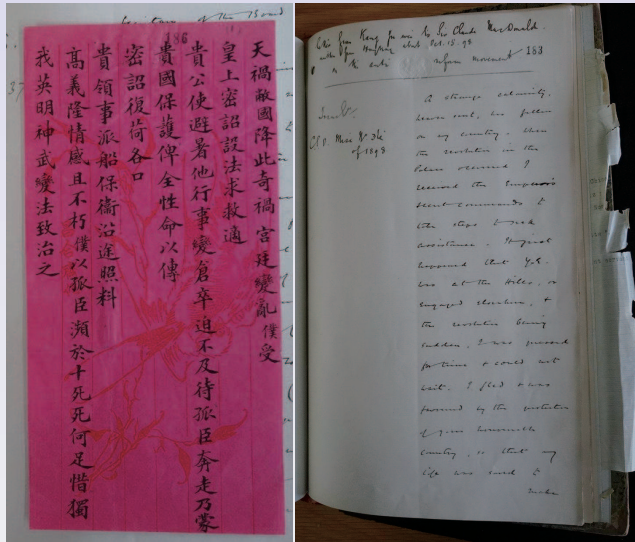
康有为致奕纳乐信函,在现存的各种康文集中未曾见到,新版的《康有为全集》也不见收录;康有为致奕纳乐照会,曾由黄彰健先生披露全文,他的来源是台北近史所收藏的康有为未刊文稿微卷。同一文书后来被收入《万木草堂遗稿外编》和《康有为全集》,与英国外交档案中的照会原件有细微差异,但照会原件与《康有为全集》所收的《致日本驻华使馆照会》,除了收件人之外,内容基本相同,后者的来源是日本外务省的档案。

我们先来看这件别处未曾见到的信函。

充满浮夸的信函

康有为致奕纳乐信函,编号是FO 233/122/36。FO 233属于英国外交部档案,全名是《北方部与外交部:驻华领事馆和公使馆杂项文件与报告》(所谓北方部,仅存在于1782年之前,后来业务合并到内政部或外交部)。这一批档案包含有英国驻华使馆和领事馆搜集的各类杂件和报告,其中一部分是中文,来自使馆的中文秘书处(Chinese Secretary's Office,简称CSO),康有为信函就是其中之一。档册的信函之后,还附有手书的英文对译件。信函的全文是:

天祸敝国,降此奇祸。宫廷变乱,仆受皇上密诏,设法求救,适贵公使避暑他行,事变仓促,迫不及待,孤臣奔走,乃蒙贵国保护,俾全性命,以传密诏;复荷各口贵领事派船保卫,沿途照料,高义隆情,感且不朽。仆以孤臣,濒于十死,死何足惜?独我英明神武变法致治之皇上,忽被幽废,此则敝国神人之所共愤,而仆之所号泣哀痛者也。我皇上厉精图治,奋发明断,一切新政,次第举行。中国人民额手庆跃,伪临朝太后守旧愚蔽,渎乱凶淫。昔在先朝,毒我显后,鸩我毅后,穆宗忧愤,以此而崩。今又与一二守旧奸臣幽我皇上,阴谋篡位,谬称训政。敝国经义:帝者,以嫡母为母,不以庶母为母。伪太后在同治,则为生母,在皇上,则先帝之遗妾耳。以昏乱之官妾,而幽英明之天子,凡我士庶,莫不痛愤。若云训政,则我皇上英明神武,在位二十四年,力行新政,日理万几,安有春秋鼎盛、圣明变法之天子而尚待训政者哉?伪太后贪渎昏淫,向阻新政。提铁路三千万、海军三千万以修颐和园;提昭信股票以修天津行官,肆其淫欲,国敝民穷,皆所



康有为致奕纳乐函及英文对译件

不恤。惟思求庇强邻,举国以托,此匪独敝国之祸,抑亦地球全局之所关系者也。贵国素仗大义,众所闻知,伏乞贵公使电达贵政府执持公义,保我国家,安我皇上圣躬,全我皇上权力,我皇上必当格外图报,以酬大德,谨谢贵国保护之德。谨为我皇上求救,伏维哀察。名正具。

在信中,康有为首先告知对方,自己是受了皇帝的密诏,向英方求救。所谓密诏,康又编为一号、二号,在同时发给奕纳乐的照会中都有全文征引。今天的研究已经证明,所谓的一号照会,受诏人是张之洞的门生杨锐,康有为通过改变和调整字句,据为己有,已不是光绪帝的原意;至于二号密诏,是给康有为本人的,此后多次被他拿出示人,版本各异,其原件却从未有人见过,经史家考证,多半为造假。这两个诏书,下文还会提到。

戊戌政变发生在1898年9月21日。在此之前,光绪帝已经用明发上谕的形式,命康有为离开北京。康本人于20日抵达塘沽,次日乘坐太古公司轮船南下。离京前,他曾经找过奕纳乐,因奕纳乐正在北戴河避暑而没能晤面。政变发生之后,京师和沿途都在拘捕康有为。由于得到了英国方面的庇护,康有为几次都化险为夷,在烟台、上海逃过了清政府的追捕。29日,他平安抵达香港。这就是书信前半部分致谢的缘故。

为了打动奕纳乐,劝说英方出手相救,康有为极力称颂光绪帝举行了三个多月的变法维新,说这场变法只因慈禧太后的“守旧愚蔽”、“阴谋篡位”而失败。他又列举了两个骇人听闻的故事,试图证明慈禧历来阴狠:一是她毒杀了慈安太后,二是毒杀了同治的皇后、她自己的儿媳阿鲁特氏,并且同治皇帝正是因为这两大变故忧愤而死。今天,稍微了解清史的人

都知道,阿鲁特氏和慈安太后均死于光绪年间。同治帝死后,慈禧太后并未在皇帝下一辈的溥字辈中寻找皇嗣,而是立醇亲王之子载湫继承大统。他不但是咸丰帝的侄子,同时也是慈禧的外甥。位居中宫的阿鲁特氏,身份变得十分尴尬。原本立溥字辈的皇嗣,她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太后,现在却成为宫里的寡嫂,在同治帝驾崩后70多天悄然逝去。应该说,她的存在对慈禧的权力没有任何威胁,慈禧杀她缺少足够的动机,还会引来朝野的指摘。因此,说她是被“鸩杀”,难以让人信服。慈安太后则死于1881年(光绪七年),她的去世比较突然。围绕她的死因,当时便有着种种猜测,但从死前的晕厥症状来看,有可能是突发心脑血管疾病。说她被毒杀,也是缺乏足够证据的。康有为将这两则传言当作事实进行陈述,还颠倒时间先后,把两件事与同治帝之死挂上钩,实在没把英国使馆的情报工作当回事。

接下来康有为所讲的中国“经义”,即嫡庶的分别,英国人未必听得懂,并且这终归是清皇室的家事,人家毕竟也还是知道光绪帝即位经过的。康有为又列举慈禧太后“贪渎昏淫”的事实:一向反动,阻挠改革进步事业,把铁路款3000万、海军经费3000万拿去修颐和园,把昭信股票款拿去修天津行官。

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导致甲午战败,这是人们熟知的历史论述;今天的研究则表明,修颐和园主要由管理海军衙门的醇亲王筹集资金,也确实与海军建设存在财政上的冲突,但园工的用度并没有那么大,约为800万两,远到不了6000万两的规模。

而中国的铁路修筑,在19世纪末期已经是重要的利源。

▶ (下转6版)